

理想与真情谱写我的人生

○张彦（1945历史）

回顾我的人生历程，在风风雨雨中度过，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但是，光辉的理想始终在向我召唤，灼热的“情”字始终温暖着我的心。父母、夫妻、儿女和兄弟姊妹的浓浓亲情，自然是支撑我人生的支柱。尤其是我们夫妻间的深情和政治思想上的绝对信任，更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能稳步前进的动力。一而再来势汹涌的政治逆流，几乎要把毫无思想准备的人们冲跨。但是，我们挺住了。因为，我们坚信自己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在忍辱中也从未却步。在共度艰难中日益深化的夫妻感情，使我们在培育四个孩子茁壮成长中享受无比幸福的天伦之乐。我们共同感悟人生，与祖国人民同步前进。我们相濡以沫，没有虚度岁月。

西南联大学步

上个世纪的40年代，我在有“民主堡垒”美誉的西南联大开始政治学步，那里的春风沐浴了天真幼稚的我。尤其幸运的是，我起步就遇上了一大批先知先觉的引路人，使我从此走上了一条革命之路，而且终身无悔。解放后，在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时，当我被逆流无情冲击的时候，正是这些战友给了我最强有力的支持、鼓励和信心。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虽然我们这些人不少也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厄运，一个个坚持真理的勇敢行为也为我树立了



2009年10月5日，张彦学长在天安门城楼上手持60年前采访开国大典时照片

光辉的榜样，给了我巨大的鼓舞和支持。1979年，“文革”终于宣告结束，中国的天空再度展现彩霞。我们这些重新获得自由的老同学、老战友们又在北京欢聚一堂了。这个历史性的聚会，在每一个与会者的心灵上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我的“商务战友”

我一生从事新闻工作。1945年当记者的第一家报纸是重庆的《商务日报》，采访的首次任务竟是1945年决定中国命运的国共两党间的“重庆谈判”。当时，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与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针锋相对，斗争激烈。《商务日报》

□ 回忆录

虽然是重庆商会的机关报，社长还是三青团的头头，这时扮演的却是一个中间角色，起了为争取和平前途“敲边鼓”的作用。这都是中共地下党渗入以后做了大量工作的结果。当时，这家报纸的编辑部和采访部的实权实际上已经掌握在几个共产党员手中。他们既精于业务，又善于做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对象。自从与这些经验丰富的老战士一起工作，我深感有幸进入了另一个革命家庭，结识了又一批师友。后来几十年的历史也证实，无论在怎样艰险的条件下，我们都是可以相互信任和支持的战友。解放以后，这些人一个个都是新闻战线的出色精英。其中，在改革开放时期载誉全国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主编就是原《商务日报》的记者钦本立。这家报纸当时发挥了思想领军的作用，也因此遭到某些人士的强权镇压，而他却坚持真理不低头，在新闻战线上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走外宣之路

也许是命中注定，我这一辈子走的最长的路，是一条用外语向世界介绍中国的道路。从重庆谈判中在上海创刊的*NEW CHINA WEEKLY*（《新华周刊》），解放战争中在香港创刊的*CHINA DIGEST*（《中国文摘》），新中国诞生后创办的第一个对外刊物*PEOPLE'S CHINA*（《人民中国》），1957年进入宋庆龄所创办的杂志*CHINA RECONSTRUCTS*（《中国建设》——现名*CHINA TODAY*《今日中国》）主持工作，直到1989年我67岁时离开岗位退休。随着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变化，如今该单位已有一支日益壮大而又

经验丰富的外宣队伍，为促进中外的互相了解和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其中的一员，我倍感温馨。生活在这个大家庭里几十年，我感悟出一条真理：中国只是这个诺大地球村里的一员，只有互相了解彼此相通，才能共存共荣。这是一个何等伟大而艰巨的任务！但是，为此献身的有志之士却大有人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就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他的一本《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认识。我有幸与同样作出很大贡献的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和陈依范（JACK CHEN）长期共事，不仅在业务上受益不浅，同时在水品上也是我学习的榜样。

飞虎奇缘

完全没有想到，当年偶然认识的几个驻扎在昆明的美国飞虎队队员，居然后来成了我的终生挚交，给我的人生经历增添了一笔浓浓的国际色彩。但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美关系进入敌对状态达30年之久，我和我的美国朋友的关系也随之断绝。“文革”期间，这件事成了我“里通外国”的“罪状”，受到迫害。1979年1月，敌对了30年的中美关系正常化了，两国庄严宣布重新建交。做梦也没有想到，经历21年厄运、刚刚在政治上获得解放的我，竟被任命为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首任驻美记者。更出乎意外的是，我到达华盛顿的第一天，一盆鲜花已经在我屋里等候着欢迎我了。赠送鲜花的不是别人，正是我的美国飞虎队老朋友，他们从几百公里外的纽约送来鲜花祝

愿我：“改写新的历史！”我与他们相约不久在纽约见面，他们说：“不行！我们已经等了35年了，不能再等了！”第二天，他们就乘飞机来与我拥抱在一起了。从此，我不仅和这些老朋友的情谊更深化了，还结交了大量的新朋友，大大加深了我对美国人民和美国社会的了解。他们视我如家人，使我感到我到处都有个温暖的家。有一次，老友贝尔从火车站把我接回他家住，一进门就将一套钥匙交给我，好让我自由出入。一天，我因为和朋友去看电影回来晚了。没有想到一进门就被贝尔怒气冲天地质问：“你上哪儿去了？”原来，因为担心我在繁华的纽约遇到什么意外，他已经向警察局、医院急诊室打过多次电话询问有没有我的名字出现。我赶忙检讨道歉没有事先告诉他我去哪里，但是内心里也为这种深情厚谊所深深感动。当时，我就写下了一篇文章《手足之情无国界》表达了我的深刻感受。与外国友人之间绽放的点滴友情火花，开阔了我的视野，更加深了我对“情”字的理解。

享受记忆

如今90高龄的我，忆往事已成为一种享受。我脑海里的那个“收藏夹”，早已装满了记忆。无论是苦涩的，还是甜美的，如今看来，在人生的旅途中都是财富。

1972年我整50，为了向生我养我的、当时正在成都避“文革”之难的母亲感恩，我特别从河南劳动改造的干校请假专程去探亲。临走，妻子交给我带去的礼物是一满筐她饲养的鸡下的蛋，每个鸡蛋上面都注明是几月几日生的。在那个什么都得凭票购买的艰难日子里，这是多么满怀

深情的珍贵礼物啊！

在成都，我意外地见到了我的革命引路人马识途。那时，他刚从“文革”中被关押了几年的监狱出来，正在家里等待被“解放”。当我敲门进去的时候，意外的惊喜让我们都激动万分，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我们随即骑上自行车奔赴杜甫草堂，去畅叙我们说不完道不尽的别情。在那里，我们意外地发现，被红卫兵斥为“四旧”要砸烂的秀丽盆景，居然一个个完整无损地在供人观赏。原来，这些盆景都被加上了一层“红色”的外衣，所以被保护下来了。比如，两座小山头之间用两根铁丝联系起来像一座桥，标签上写的却是：“红军过大渡河”。于是，红卫兵就不敢碰了。中国老百姓多聪明啊！

2003年，次子大龙开车送我们去河南上乐村作了一次十分特殊的“探亲”旅行。“文革”高潮的1969年，除了长女蓓利已被送往东北兵团插队和15岁的长子小彦被留下分配到副食店卖肉外，我们全家被林彪的“一号命令”视为“首都不受欢迎的人”扫地出门送往河南汲县上乐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时，大龙不过10岁，他的妹妹小虹也才5岁上幼儿园。对于上乐村，这是一批“牛鬼蛇神”被送来进行“劳动改造”的。可以想象，我们这些人的“政治面目”是怎样被介绍给农民的。但是，我们发现，乡亲们并没有信这个“邪”，而是以眼见为实。很快，我们在共同劳动中变成了好朋友，彼此关怀照顾。我无形中成了生产大队的“秘书”，他们有什么文字工作就来找我帮忙。我的爱人在当地中学任教，成为学生最敬爱的老师，学生经常主动来我们家

□ 回忆录

帮忙挑水干活。常常，早晨一开大门就发现，不知哪个学生又给送来了一堆新鲜蔬菜。于是，我爱人就将它带到学校食堂做给大家吃。师生之间，自然而然地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还记得若干年后形势大好，我们决定再次去“上乐村”探望这些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老朋友时的感人情景：我们的汽车还没有进村，在高速路上就被前来欢迎的一群乡亲拦住了，我们大家情不自禁地拥抱在一起。在重返上乐村的日子里，我们最深的感受就是三个字：“回家了！”这种油然而生的感情，若不是亲身经历，真不敢想象。在几十个学生热烈欢迎我们的联欢会上，大家都热情地唱起了《友谊地久天长》！

2004年，我的幸存的两个飞虎队老友之一迪克帕斯特（DICK PASTOR）已经是86岁的老人，而且还只能靠轮椅活动。他却表达了他要在有生之年实现重返昆明与中国老友重聚的强烈愿望。医生不允许他作长途旅行。但是，经过几个月的疗养以后，他终于和他已经90岁的夫人乃阿蜜（NAOMI）一起实现了愿望。为此，当时远居成都并已年过90的马识途和在北京82岁的我都赶到了昆明，圆了我们60年后再相会的梦。我们在大观楼寻找我们60年前聚会时的足迹，回到西南联大旧址，与今天的大学生重叙我们难以忘怀的往事。当时，我们无比深切地怀念着当年的每一个中美战友。虽然现在，他们大都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但是，对于我们，他们一个个都活在我们心里，爽朗的笑声回响在耳边。尽管如此，我和他们的下一代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他们来中国时必来看我们。我们和美国飞虎队员之间的深厚友

情，深深地打动了热情的旅美纪录片制作者陈德福先生。他竟不惜工本，自筹资金，前后花了十年功夫，将它拍成了感人的四集记录片《飞虎奇缘》。为了让这个反映中美人民友谊的故事发扬光大，他的执着精神，使大家为之动容。

老年的感悟

如今的我，虽然早已离休在家，却并不感到寂寞。我和弟弟妹妹们，虽然不住在一起，却经常聚会，他们对我这个被视为“长兄如父”的人真可谓关怀备至，我感到十分幸福。我和其他的离退休同志都不约而同地认为，我们单位的老干部办公室就像是我们的又一个家。一年四季，像亲人一样从各个方面为我们着想，要让我们活得既健康、又快乐。从自己的生活和周围社区与时俱进的更新，让人切身体会到改革开放给祖国带来的巨变。真难以想象，今天的中国经济居然登上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位。我们这些老人，虽然不能有所贡献，也感到无比自豪。

我之所以能不感到寂寞，还应该感谢高科技的互联网。我每天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上网。顷刻之间，整个世界就奔来眼底。我与国内外友人之间的热线立刻畅通，往往已经有几十封信等我去拆。有的是转发来最新的天下大事，有的是问寒问暖的感情交流，让人立刻感到暖烘烘的。如果打开电脑上的SKYPE，还可以和远在大洋彼岸的儿女亲人在视频上面对面地聊天。互联网这个新事物的出现，虽然只是近一二十年的事，却已经大大地改变了世界。中国之所以能发展得这样迅猛，也不能不归功于

它。从个人而言，我也是一个互联网的受益者，它既使我能与天下大事不脱节，又能帮助我保持思维敏捷，不至于得老年痴呆症。当然，天下大事如果看好，令人高兴；如果是坏事，也免不了让人为此忧心重重。我们这一代人，虽然已无能为力，但却已养成了这个痼疾。

进入老年以来，因为没有什么外来的任务压在身上，就有时间去感悟自己的人生。有一年，我去访问我所敬佩的周恩来在绍兴的故居，看到他用以自勉的格言是：“事能知足心常泰，人到无求品自高”。这两句话，从此也成了我前进的方向标。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就更深切体会到此中的真理。只有无所求了，才能知足，才能快乐，品位也才能高。我的网友

中，有这么几个热心人总是不辞辛劳地定期将杂乱的信息整理有序转发给友人，我就是受惠者之一。于是，我也向他们学习，将有益的信息、特别是有利于人们增进健康和修养的珍贵资料，及时地转发给我的好友。事情虽小，也算是助人为乐，心里也感到一点安慰。

工程院院士秦伯益在网上发表文章说：“老人，活的就是一种心态”。我全心全意地支持他这一精辟的观点。

苏东坡说过：“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他还说：“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这个大文学家对人生的看法，多潇洒！

一切顺其自然，享受人生，足矣。

我有幸参加了澳门回归的筹备工作

○周礼杲（1953电机）



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钱其琛主任接见周礼杲（左）

澳门是16世纪中叶以后逐步被葡萄牙人占领的。初始在1594年，葡萄牙人曾在

澳门建立了一所圣保禄学院（圣保禄大教堂），它是远东地区第一所西式大学，不过时间不长，该学院后被大火焚毁，至今只留下其门楼，俗称“大三巴牌坊”，几百年不倒，成为澳门今天的地标建筑，游人必到。直到1981年香港人来澳门创办了近代第一所高校——私立东亚大学。1988年，中葡两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声明，澳门将于1999年12月20日回归中国，澳葡政府才决定要建立澳门的高等教育，于是将东亚大学收购过来，进行改建调整。将大专部分分出成立（公立）澳门理工学院；将成人教育的东亚公开学院分出成立（私立）“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现